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16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关于十九届中央第四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关于2019年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重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 “把创作的一半交给读者完成”

——访作家冯骥才

□本报记者 丛子钰

记者:1985年,《作家》杂志曾经约你写一篇文章,谈你对韩少功《文学的根》的看法。你在一篇文章里说,当时本来是有一个看法要说的,但是最后没有写出来。您本来要写的是什么?

冯骥才:《神鞭》发表后,《作家》杂志给我写了封信,觉得我在文化问题上肯定有些想法,就把韩少功的文章大样发给了我,希望我发表意见。

我认为韩少功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作家。写小说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纯写小说的小说家,一本一本写起来没完;还有一种作家更关心社会,头脑里总装着一些超出小说的东西,这一类属于文学家。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是一个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时代。在开放的初期,走在最前边冲锋陷阵的是一批作家,哲学界、思想界、理论界也都特别活跃。那时候大家愿意发表一些很有见地的也很有勇气的、跟现实结合得很紧密的观点,每一篇文章、每一个观点发表出来,都是为了推动这个社会往前走。

那时候的文坛是相互支持的,而且大家在心里都认为文学是神圣的、纯粹的。我接到韩少功文章大样的时候,很激动。文章一开始,他就问:文化到哪儿去了?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思考过。我后来在9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我当时从意大利回来的时候,路过意大利的三个城市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我在文章中就用中国的三个城市与它们进行比较,一个是郑州,一个是开封,还有一个是洛阳。我们这三个城市作为中华大地的三座古城,它们都位于中华民族腹地,有着深厚历史文化,但是你站在那个城市里放眼一看,好像我们的历史找不着了。所以,我在1990年开始做文化抢救,就是出于这种对文化的感情。我觉得韩少功感动我的,首先就是他那种文化的情怀。

记者: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转向对文化问题的关注,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趋向。这对您的写作有何影响?

冯骥才:我和刘心武那时候在《人民文学》讨论,是写社会还是写人生的问题。刚开始,写伤痕文学的时候,主要写的是社会问题。那时候,整个社会积攒了大量不开的社会问题,需要作家去撞击它,把问题提出来,让人们思考。可是写到几年之后,我们就开始想往里扎,往文学性里“扎”。在“扎”的时候,我开始写《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这样的小说。要进入文学本身,人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路遥后来写了一篇小说,名字就叫《人生》。那一代作家很有意思,都有一种作家的情怀、文化的情怀。

90年代的时候,我开始把笔放下来,做天津的一些城市保护工作,跑到第一线去做。到一线工作之后,我发现我们大地上的文化状况,就跟韩少功讲的情况一样。在《文学的根》中,韩少功引用了阿城的一句话:“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这句话,我印象很深,这个悖论讲得很好,如果不注意保护,有很多文明就失落了。但是,也不容易被完全忘却,可能有很多东西还是在人世。

当时我已经开始思考文化的问题,到写《三寸金莲》和《俗世奇人》的时候,我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就更清晰了。我认为,一个地域的文化,除去保留在精英文化里的精神文化,还有保留在民间文化里的生活文化,比如各种民俗,包



括民间节日活动、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等。作家确实要通过精神文化书写来寻文化的根,但我个人要做的,跟“寻根文学”作家们做的,还不完全一样。我更关切的是这个文化中最深刻的东西,实际就是地域性格,地域性格形成后往往是不可逆的。比如,北京的文化性格就表现为老舍所写的北京人和后来王朔所写的北京人。上海也是这样,就是王安忆所写的上海人的地域性格。

《俗世奇人》里的这组人物,实际上我还没写完,准备继续写。现在写了三十多篇50多个人。写完这50多个人,再加上我原来写的几个中短篇,基本上就把天津人的性格留在纸上了。我觉得这是最深刻的文化,也不容易被忘掉。所以后来我在做民间文化抢救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出于一种作家情怀。

记者:你在创作《神鞭》包括后来的《三寸金莲》时,是不是对于后来整个寻根文学,包括80年代末的“文化热”已经有所预感?

冯骥才:作家对时代是最敏感的,所以感悟几乎是一样的。我最早写的小说,本来叫《创伤》。这是一篇中篇小说,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我还没有拿出来交给出版社的时候,卢新华已经把《伤痕》写出来,发表在《文汇报》了。于是我的小说就不能叫《创伤》了,所以我临时改名字,最后叫做《辅花的歧路》。后来,当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时,我的《神鞭》已经写完了。但是,我对文化的具体想法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我写文化问题总是观照现实,不会纯写历史文化。其实每个作家都不一样,但是都觉得文化是肥沃的、深厚的土壤,都可以从中挖一口自己的深井。

记者:您的创作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您怎么看待“现实主义”?

冯骥才:很多人容易误解现实主义,以为现实主义就是写现实的文学,实际上并不是,现实主义是一种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实主义要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另外要有生动的细节。现实主义手法在我的小说里很多,从早期的伤痕文学一直到《单筒望远镜》。我要表现的东西太大了,需要非常直接地把它写出来,所以我还是采取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另外,我也用一种“以历史观照现实”的写法,非常典型的就是《神鞭》。我为什么喜欢这样的小说?因为这种小说是一个有弹性的袋子,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当我有很多很稀奇古怪的想法,可能就会写先锋小说。当我面对现实,感到现实本身的力量足够强大,有时候比艺术家的想象更有创造力的时候,我当然会用现实主义或者非虚构的方法。很多小说写的好像是历史,实际并不是历史,而是现实问题。《西游记》就是这样的小说。

中国文化艺术有一个独特的东西,就是把创作的一半交给读者自己完成。在戏剧舞台上,比如《十八相送》,梁山伯和祝英台结伴而行,一会儿路过庙,一会儿是桥,一会儿是井。实际上没有庙,也没有桥和井,他们俩就这么把十八里走过来了。可是台下观众看得非常满足,为什么呢?因为演员一边唱的时候,你会一边思索和想象,你也进入创作了。所以,中国艺术伟大在哪儿?它把一部分创作交给读者了,就跟国画里的留白一样。

记者:您既是作家,也曾是评论刊物《文学自由谈》的主编。您怎么看待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关系?

冯骥才:我办过很多刊物,有一种叫《口袋小说》。我提倡要把生活中一些非常有灵性的东西写成小说。那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解放小说的样式》,认为小说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样式,自由地去创造。我当时非常喜欢评论和争论。有一次,我的作品发表之后,我收到很多批评甚至谩骂的信。后来上海《书友》杂志找到我,希望我把这些信给他们发表,我选了14封信寄去。他们主编看完后说,这有损作家的形象,不宜发表,又给我退回来了。我给他回了封信说,你们错了。作家就应该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争论中间,这样才能激活作家的活力。

有一次,我们去萧伯纳故居参观,看见书房里挂了一张巨大的画像。当地人介绍说,这个人就是萧伯纳。作品一发表,他就要批评,所以萧伯纳就找人画了一张这个人的像挂在书桌对面,用这个人来激励自己。这让我觉得,萧伯纳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批评可以激发一个作家的思考再思考,所以,我办《文学自由谈》的时候定了一条原则:这个杂志只能批评我,不能发表我的文章。我觉得我们太需要自由的批评,如果没有自由的批评,文学也没法活跃。所谓自由的批评不是政治批评,也不是无理谩骂,它是关于文学本身的一些不同意见。批评是把另外一种文学的主张和看法提出来,对别人也可能是一种启发。根据我的经验,批评越多的艺术领域往往就越活跃。批评家应该按照文学艺术的规律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这样的批评,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宽容的。

## 新中国文学七十年和新时代创作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近日,由《小说选刊》杂志社和山西省作协共同主办的新中国文学七十年和新时代创作研讨会在太原召开。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廖奔,山西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杜学文,《小说选刊》主编徐坤,以及张锐锋、李晓东、邓一光、吴克敬、田瑛、朱辉、王春林、潘灵、葛水平、津子围、李骏虎、鲁顺民等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参加会议。

与会专家谈到,新中国七十年文学,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作家作品纷纷涌现,构成了极为丰富的文学景观。在这其中,现实主义创作始终占据主流地位。从山西的“山药蛋派”、河北的“荷花淀派”,到陕西、江苏、山东、河南等地的各种现实主义风格创作,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创作潮流。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现在的新时代,现实主义佳作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作家们没有停止探索的步伐,根据不同的题材、内容,采取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创作,使文学百花园更为繁荣。

对于新时代的创作,大家认为,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这是进行文学创作、评论与研究的指导思想。文学要履行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责任和使命,就必须继承老作家的好传统、好作风,并根据新时代的语境和需求,创作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佳作。近年来,各级作协积极组织广大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到扶贫第一线进行采访,催生出一批精品佳作,拉近了作家和读者的距离,产生了多方面的效益。作家要进一步增强深入生活的自觉性,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李墨波)

## 王峰诗集《天际线》首发

本报讯 1月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和作家出版社主办的飞行员诗人王峰诗集《天际线》研讨暨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山航集团纪委书记林海波,中国民航大学副校长杨虎,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路英勇等出席活动。施战军、张清华、唐晓渡、欧阳江河、王家新等诗人、评论家与会研讨。

与会者谈到,飞行员诗人王峰对“飞行”与“诗歌”均有独到的理解,他在不同的维度上实践着对人对自由的追寻和守护。飞行和诗歌本身有一种古老的隐喻关系,王峰自觉、投入地抒写飞行领域,具有独到的角度、眼光和感受力。王峰是一个有朝气、有正能量的诗人,他在天空和大地之间游走和创作,对世间一切充满敬畏,对大地上的事物充满珍视和怜悯,他的诗歌在天空和大地之间,在大与小、远与近、心灵和宇宙之间自由切换,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欣 闻)

## 《与虫在野》新书发布

本报讯(记者 王冕) 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主办的“单眼与复眼的荒野邂逅——半夏《与虫在野》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科普作家张劲硕、评论家季亚娅、主持人周微与作者共聚一堂,围绕新书展开交流分享。

《与虫在野》是一部关于昆虫的“百科全书”,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作者寄情自然的亲历故事。为创作这部作品,半夏历时5年俯身大地,透过双眼和镜头直面昆虫的世界和自己内心的“博物之爱”。她对虫类的友爱之心生动阐述了各个物种的周期节律,传递出寄情自然的人文关怀。与会者认为,作者专注于博物之趣,饱含深情地创作出这本有趣的读物,展现了其家乡的生物多样性。作品将文学与科学有机结合,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透露出文化的内涵。在半夏看来,在人与自然的系统里可以找到与自我相处的完美关系,希望更多人尝试着寄情自然,懂得细微处的美好。

## 张守仁推出《名作家记》

本报讯(记者 王冕) 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联合主办的“我经历的新时期文学黄金岁月——张守仁《名作家记》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作者与宁肯、周晓枫、彭程等作家、评论家共聚一堂,围绕新书展开交流分享。

张守仁生于1933年,是文学期刊《十月》创始人之一,曾任《十月》副主编,从事文学编辑工作40余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名作家记》是他的最新散文集,记述了他与数十位知名作家的交往故事。在长期的编辑生涯中,张守仁与作家们围绕文学和作品接触渐深,成为挚友、诤友,情谊深厚。他有着很强的记忆力,又常年以日记记录生活点滴,因此即使在耄耋之年抚今追昔,也能做到笔下所写准确详实、细节清晰。

与会者认为,《名作家记》贯穿了中国当代文坛各种流派和名家林立的全过程。从这部书中,可见名作家们的人生经历、文学见解、个性特质甚或鲜为人知的情感故事,可观时代细节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变迁。作者用一种让文学史形象化、具体化、鲜活化的方式,对中国文学的黄金岁月进行了一次深邃的凝视,赋予时代中的各种人物和经典文学以独一无二的认识方式,脉搏跃动,血肉丰满。作者对文学事业怀有赤诚的热爱,多年来与作家们密切交往,因此他笔下的每一位人物都是鲜活生动的。

张守仁表示,他所交往过的这些老作家们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满腔的爱国心。“写下长达40多年的编辑记忆,记下新时期黄金岁月中文学刊物《十月》的风采,录下作家们的音容笑貌、情感历程、生活细节,不让他们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这是我晚年必须做的事,也算是我这个老编辑留存给读者的一份薄礼吧。”

## 中国诗歌网启动十大校园诗人评选

本报讯 为展现校园诗歌创作风貌,引领校园诗歌写作潮流,《诗刊》社中国诗歌网将与分享通信集团共同举办一场面向全国范围大、中、小学生通信集团的征文活动——“分享通信·尚5G杯”十大校园诗人评选。1月3日,“十大校园诗人评选”启动仪式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出席并讲话。《诗刊》社主编李少君、主编助理霍俊明,分享通信集团董事长蒋志祥,中国诗歌网总编辑金石开,以及曹宇翔、汪剑钊等诗人、评论家参加启动仪式。

白庚胜在讲话中说,诗歌的进一步繁荣发展,需要更多的青年诗人涌现出来。此次征文评选

活动旨在激励广大校园诗人的创作热情,发掘更多优秀青年诗歌写作者,为新时代中国诗歌的繁荣提供更多的后备力量。

大家在发言中表示,《诗刊》社和中国诗歌网近年来在推动诗歌走向大众方面推出了许多有意义的举措。这次评选活动将有利于促进诗歌走向校园,让校园焕发诗的生机与活力。如今的校园诗人有幸赶上5G时代,移动互联网必将更好地助推优秀诗人诗作的传播。

据悉,本次活动将分为大学组和中小学组,各评出十大校园诗人。投稿通道近日在中国诗歌网正式发布。(欣 闻)



由岭南画派纪念馆、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美协、北京画院主办,北京画院美术馆承办的“重师造化——黎雄才的寻源之路”近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作为北京画院“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的重要项目,此次展览选择岭南画派代表画家黎雄才为研究对象,以“重师造化”为题,分成“万里只车随展——对景写生”“气候百态凿洪濠——变革新风”“河山脚底蓝本供——创变粉本”三大板块,共展出了黎雄才的百余件画作。展览将其置于整个20世纪中国画发展情境之中,试图回归黎雄才“寻源之路”的创作轨迹与艺术实践。展览将持续至2020年2月23日。图为黎雄才作品《西子湖》。(小 辰)

## 江苏组织评选年度优秀文学作品

本报讯 近日,由江苏省作协和高邮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在江苏高邮揭晓。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中共高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建奇等参加颁奖活动。

本届评奖于2019年6月启动,评选范围为2017至2018年度国内公开发行的报刊所截短篇小说,经提名委员会提名,复评委员会评审,最后由终评会评出,《火烧云》《白耳夜鹭》《滞留于屋檐的雨滴》《两瓶酒》《等待摩西》《红尘慈悲》《旧姑娘》等作品获奖。

作为本届汪曾祺文学奖评委会主任,吴义勤说,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学具有标志性的作家,他的很多小说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举办汪曾祺文学奖,就是要把他的作品、他的风格,推介给更多的读者,同时激发当代短篇小说的创新活力。同时,汪曾祺文学奖的设立,对于挖掘地方文化内涵、延续地方文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介绍,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颁奖典礼将于2020年汪曾祺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在高邮举行。

又讯 1月4日,“《扬子江文学评论》2019年度文学排行榜”正式发布。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阿来的《云中记》、蒋韵的《你好,安娜》等5部作品入选长篇小说榜,田耳的《开屏术》、蔡东的《来访者》、孙频的《鲛在水中》等9篇作品入选中篇小说榜,迟子建的《炖马靴》、邵丽的《天台上的父亲》、哲贵的《图谱》等5篇作品入选短篇小说榜,欧阳江河的《埃及行星》、胡弦的《蝴蝶》、蓝蓝的《海之书》等7组作品入选诗歌榜,于坚的《父亲记》、万方的《你和我》、张承志的《拉萨的启示》等8部作品入选散文(含非虚构)榜。

据介绍,“《扬子江文学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创办于2017年,已连续举办三届,旨在发现大时代里具有大格局、大气象的作品。本届榜单的出炉经过了初评、终评两个阶段。提名评委由33位青年批评家组成,有效提名413部作品,涵盖75家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终评委由17位知名批评家和刊物主编组成,力求体现职业背景、文学观点的多元性,以保障排行榜的视野足够开阔。(苏 文)